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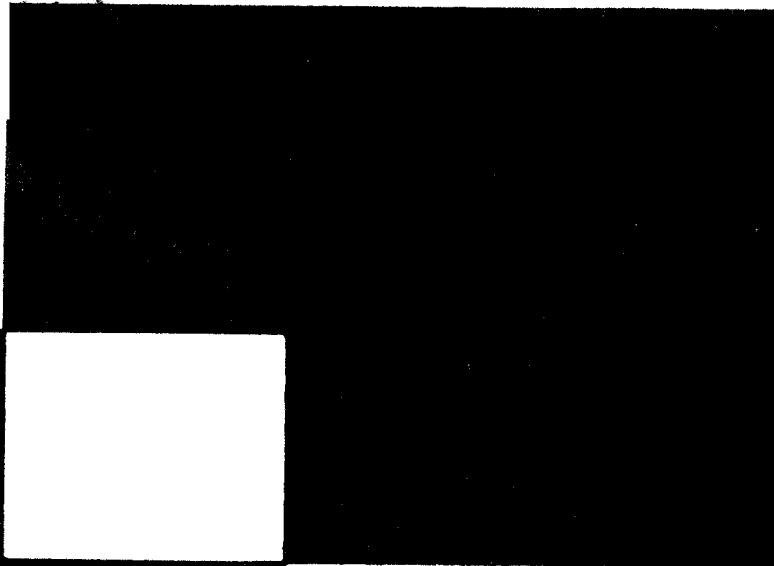
GUO GONG
HE ZUO SHI
重庆出版社

国共合作史

林家有 褚倩红 编著
周兴梁 王杰

● GUO GONG
● HE ZUO SHI
● 重庆出版社

国共合作史



林家有 编著
周兴华 主编

责任编辑：王登林

封面设计：陆 川

林家有主编
国 共 合 作 史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插页4 字数 252千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

ISBN 7-5366-0021-6

K·5

书号：11114·113 定价：2.85元

2697/18

前　　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

1924年—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帝国主义支持旧军阀，分裂割据中国大地，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高潮正在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

帝国主义支持封建军阀在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不仅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无法生活，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境况也一日不如一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当时各阶级的共同要求。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有可能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一起，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国共两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共同缔造第一次国共合作，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使我国革命展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后不久，便建立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以1925年上海“五卅”工人运动为爆发点，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1926年，从广东出发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的北伐大军，由于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势如破竹，很快就把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部队基本上消灭了。只不过半年多的时间，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迅

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眼看革命军即将直捣幽燕，北洋政府即将覆灭，国民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下，国民党的右派却破坏了国共合作，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36年—1946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山河破碎，沉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祖国大地，全民族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而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建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基础是抗日救国，拯救中华民族。目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动员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广泛参加抗日战争。在这次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来敌人入侵中国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在全民族奋起抗战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抗击了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抗日根据地军民，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对促成抗日战争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中，国民党一些主要当权者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而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政府官员却是坚持抗日的。在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军队在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顾全国家和民族的大局，提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国共长期合作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但是，国民党当局却背离人民的意志，

撕毁停战协定和和平合作的一切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因而，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再次遭到彻底破坏，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内战的苦难深渊！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共同倡议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第一次合作，使中国革命发展成为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一次国共合作，距今已60多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距今也已50年。然而，两次国共合作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丝毫未随时光的流逝而被淹没。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对国家、民族和两党本身都有益处，合作大得人心，分裂必大失人心，这是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提出实现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都殷切希望国共两党能够早日实现第三次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以便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振兴中华。在这个时候，我们把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是希望能够温故而知新，通过对书中两次国共合作史实的了解，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努力，为促进大陆、台湾实现“三通”和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我们的力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概 说.....	(3)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3)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中国形势.....	(10)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提出.....	(17)
(一)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7)
(二)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主张.....	(25)
三、共产国际在中国选择联合对象问题的探索.....	(29)
(一)接近吴佩孚与试探陈炯明.....	(29)
(二)联合孙中山.....	(35)
四、孙中山联共思想的产生和确立.....	(39)
(一)寻求同盟者的历史教训与探寻盟友思想的变化.....	(39)
(二)陈炯明叛变和孙中山联共思想的确立.....	(42)
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 确立.....	(47)
(一)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争论.....	(47)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基本原则的确立.....	(51)

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基础	(54)
(一)国共两党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共同认识	(54)
(二)国共两党共同革命的需要	(58)
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63)
(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63)
(二)联共案的通过	(67)
(三)大会《宣言》的通过	(71)
(四)国民党政改组任务的完成	(77)
八、黄埔建军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83)
(一)黄埔军校的创建	(83)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83)
九、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和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	(95)
(一)孙中山扶助农工思想的确立	(95)
(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	(101)
(三)广东农民、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106)
十、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	(112)
(一)冯自由派与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	(112)
(二)“戴季陶主义”、“孙文学会”右派思潮与团体的出笼	(117)
(三)共产党人协同国民党左派维护国共合作的斗争	(122)
十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右派的背叛	(127)
(一)北伐军胜利北上	(127)
(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	(132)
(三)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39)
十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证明：合则两益，分则两害	(144)

第二编 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149)
(一)“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	(149)
(二)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扩张，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154)
(三)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加强	(157)
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	(160)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60)
(二)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开始转变	(164)
三、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170)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	(170)
(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175)
(三)国共关于联合抗战的初步谈判	(180)
四、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开端	(186)
(一)西北地区合作抗日	(186)
(二)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
(三)国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199)
五、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205)
(一)关于联合抗日的谈判	(205)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	(211)
六、国共合作抗战	(220)
(一)正面战场对日军的抗击	(220)
(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228)
七、国共合作后的两种抗日方针	(235)
(一)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35)
(二)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	(239)

(三)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245)
八、国共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	(252)
(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反共方针的制定	(252)
(二)反共高潮的发生与解决	(260)
九、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	(267)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	(267)
(二)共产党对事变的决策	(272)
(三)改善两党关系的谈判	(278)
十、国共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286)
(一)民主政治问题的商议	(286)
(二)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292)
十一、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问题的谈判	(297)
(一)重庆谈判	(297)
(二)政协会议的召开	(304)
(三)政协决议贯彻的障碍	(312)
十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320)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	(320)
(二)国共两党合作的再次分裂	(323)
(三)历史的启示	(327)
后记	(332)

第一编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概说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中国 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同盟会成立后，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组织，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同盟会是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兴中会为中心，联合湖南的华兴会、浙江的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最初加盟者仅数百人，后来中国十七省留日青年学生均参加。成立大会除讨论决定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外，评议部长等亦同时举出，并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①“驱除鞑虏”，即推翻清政府。“恢复中华”，即实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

^①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中国入任之”。“创立民国”，即建立一个“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平均地权”，即通过“核定地价，增价为公”，限制大地主垄断土地“以制国民之生命”。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十六个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原则。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的纲领，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又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但它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要求，它具有时代精神和革命气概。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制订，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成为民主革命高涨的起点。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大造革命舆论，向改良派发动思想进攻的同时，又领导武装起义，向清王朝发动军事进攻。在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革命党人的不断起义同风起云涌的各族人民群众自发斗争相配合，不到六年时间就颠覆了清王朝，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然而，同盟会毕竟是一个没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组织，加上组成同盟会的各团体之间的宗派界限和政治分歧，这就为同盟会预伏了日后分裂的危机。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章太炎等同盟会员竟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些同盟会员以为革命目的已达到，主张终止革命；有的与北洋派妥协，谋取高官厚禄；有的引退林泉，不问政事；有的另组新党，分裂组织。这正是同盟会组织涣散，政见不一的必然结果。宋教仁为矫正此种局面，推行政党政治，遂于1912年8月25日，在

北京将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党等政团组织合并组成国民党。^①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加强了政党的职能，在政党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但它并未改变同盟会组织严重不纯的缺点，反而在议会斗争中为了争取多数席位，竟不惜滥收党员，致使官僚、政客纷纷趁机混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人虽多，但如一盘散沙，无所作为。加上孙中山和黄兴皆不能在京指挥，乃委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主持国民党工作。宋教仁发挥了她的政治才能，在组织国民党同立宪政党的斗争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并对袁世凯的篡权复辟活动作了揭露和斗争。如此，宋教仁为袁世凯所不容。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武英士等凶徒于上海车站刺杀宋教仁。22日晨，宋因伤势过重逝世。国民党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极度混乱。

宋案发生，举国震动。3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抵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开会，孙中山指出：袁世凯排除异己，是杀害宋教仁主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黄兴和大部分与会者则主张“法律解决”。^② 由于意见分歧，未能对袁世凯及时兴师征讨。袁得时机，一面暗助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一面极力唆诱国民党内不坚定分子另组他党，使内部分裂。6月，袁世凯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这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因宋案及反对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引起袁氏的愤恨。袁世凯清除异己维护独裁的举动激起国民党人的反抗。从7月2日起，李烈钧、黄兴、陈其美、柏文蔚、陈炯明、许崇智等接连起兵于东南各省，掀起讨袁运动。7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讨袁世凯罪行的宣言，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编，第130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7月版。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第161页，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

指出：“宋案”发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罪恶阴谋，对于袁氏排除异己，诛杀革命者的罪行，只有宣布天下，动员人民起来讨伐，没有别的出路。讨袁令一下，东南人民便起来对袁氏“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希望袁世凯辞职，“以息战祸。”^①同一天，孙中山又发表讨袁通电，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国民党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上各省起事步调不一，各自为谋，而袁氏则利用其兵力压迫和金钱收买各省军官，致使“二次革命”不一月而失败。

“二次革命”的失败，考验了人们。孙中山为代表的真正革命者则愈挫愈勇，坚持斗争；但意志脆弱者则从此悲观颓唐，不问政事。有的醉心高官厚禄，卖身求荣。特别是那些官僚政客，只热心于投机钻营，致使党德政德，荡然无存。有的还在报刊上刊登启事宣布脱党，解散组织。国民党土崩瓦解。孙中山对此十分痛心。他说：“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当之者摧，撝之者折，其志行之坚，牺牲之大，国中无二。”^②但是，“二次革命”后，随着革命热情的消失，“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于傀儡，党员有类于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③

孙中山为了重振革命精神，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涣散状态，于1914年，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为改变国民党滥收党员、组织不纯状况，孙中山提出这次组党“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规定入党，必须宣誓

^①孙中山：《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国父全集》第1册，第806页。台湾1973年6月版。

^②孙中山：《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国父全集》第1册，第872页。

^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第264页。

“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孙中山强调党的纯洁是完全必要的，但把自己变成党的灵魂，一切得服从孙中山自己，这又走上脱离群众的另一极端，在组织发展上又犯了关门主义毛病，以致中华革命党成立数年，革命毫无起色。

1918年5月，孙中山为滇系军阀唐继尧所逼，辞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退居上海。他回顾以往，展望前程，深感“从根本上想，非整理党务，先固实力，不足以及时奋起”，于是潜心党务，重订党章，于1919年10月10日，把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但由于孙中山不久又忙于组织力量，讨伐盘踞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重组广州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所以，政务、军务繁忙，党务未能顾及，没有能防止腐败官僚、政客以及其他不良分子混入党内，于是，国民党又重蹈覆辙，变成“权利是猎，臣妾可为”的营私团体。特别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党军叛党，所谓的“国民党员”参预谋杀党魁，说明国民党的组织已混乱不堪。因此，孙中山慨叹道：综十数年国民党“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家乡”，致使国势艰危，“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澜，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为讳者也。”孙中山把这时的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只有输进新鲜血液才能“起死回生”。面对当时的形势，孙中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心改变以往“以军治党”、“武人专横”的弊病，从宣传“党义”、注重“党德”，开始“训练党员”。他一方面运用国民党内部的健康因素，另一方面借助共产党的新生力量，决心改组国民党。从1922年底起，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制订了新的党纲党章，确定党的新的三民主义指导思想，并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改组国